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二期 ——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9d)

【史实辨析】 "罗瑞卿事件"的林豆豆说法之辨疑 韩 钢 【史海钩沉】 严慰冰匿名信案始末与辨析 丁凯文 【文革一页】 "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 阎长贵 【回首文革】 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出笼 吴林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 页: //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 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 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辨析】

"罗瑞卿事件"的林豆豆说法之辨疑

• 韩 钢 •

◇ "大警卫员"为何突遭整肃?

1965年的罗瑞卿事件,是"文革"之前的重要人事变动之一。罗对毛泽东的忠诚在中共党内有口皆碑,1965年被整肃,令党内高层愕然和震惊。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对他的"大警卫员"(党内对罗的一种褒称)下此狠心?长期以来官方的说法即主流的说法,是源于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猜忌总参谋长罗瑞卿要"夺取军权",向毛泽东进谗言,毛听信林的诬陷,错误处理了罗瑞卿。(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事情的起因主要是林罗交恶,毛出于发动"文革"需要林及军方支持的考虑,丢卒保车,倒罗挺林。这种解释与官方说法有所不同,但大体一致。近些年来,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提出另一种看法:不是毛听信林,而是毛本人逐渐反感罗,利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将帅对罗的不满,逐罗出局。毛为何反感罗?原因在于1960年代毛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策主张愈来愈不满意,而罗同刘、邓等人关系密切,又反对林"突出政治"的治军方针,对官传"毛泽东

思想"的高调亦有微词。酝酿打倒刘、邓的"文革"之前,需要先清除党内高层的"路障",罗(还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便成了"文革"的第一批"阶下囚"。

上述解释各有理由,不过坦率地说,从已经公开的著述看,前者虽遭质疑但尚有一些史料依据,而后者判断居多、史料嫌少。孰实孰虚,如无档案史料和知情人的进一步披露,仍是悬疑。

2012年出版的《林豆豆口述》收录了林豆豆1980年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我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详述了她所知、所闻的罗瑞卿事件经过。林豆豆的观点属于上述第二种看法。申诉材料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情况,也留下一些疑点和错讹。

从林豆豆的申述材料看,林彪对罗瑞卿确有看法,也曾"大发脾气"。一件具体的事情是196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在会上作了一个总结发言,林肯定内容尚好,但罗"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尊重不够","没注意谦虚谨慎",方法上与技术上简单、草率、欠妥。林要求罗"多尊重和请示其他所有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但林豆豆称,林、罗之间历来"直言相叙","不存在虚伪的关系"。至于林发脾气,林豆豆的解释是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挑拨,同时其父也"实在是出于好心,而并非任何私念";罗也"痛悔"自己没有想到这些,对林的提醒"极为感动"。林豆豆还讲了一件事,全军五级干部的定级名单未经"林办"即直接报送中央批准。此事林彪没有"责怪"罗瑞卿,但名单引起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很大意见。(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

尽管林豆豆承认林对罗的看法,但申诉材料更多还是强调林、罗间的良好关系。比如,林严格规定叶群不准在他和其他人面前说罗的不好,多次严厉告诫叶。罗也关心林的病情,多次嘱咐叶群及子女照顾好林。罗去林家,对未能常去看望林表示歉疚;林很大度,理解罗工作太忙,安慰罗说"见到你,就高兴"。这种良好关系还延伸到两家间的关系,叶群甚至专门请罗瑞卿夫妇到家里做客。申述材料主要就是记述1965年一个夏夜,罗瑞卿去林宅同叶群谈话的经过。关于这次罗、叶夜谈,一些著述已有记述。按这些记述,不仅是叶主动约罗去谈,而且两人话不投机,罗多次"沉默"。林豆豆记忆则不同。罗瑞卿去林家是主动打电话求见,因林已休息,罗同身为"林办"主任的叶群长谈。叶还让林豆豆和林立果参加谈话。罗虽未见到林彪,但同叶群谈话气氛融洽,而且对林的孩子(林豆豆、林立果)亦态度亲和,关心备至。叶群也对罗说了许多表示尊重和团结的话。第二天,叶向林彪报告了前夜与罗的谈话,林责怪叶"插手",叶还要林豆豆、林立果"作证",她是非常尊重和团结罗的。

林豆豆在申诉材料里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罗瑞卿事件并非林、罗交恶,而另有背景。材料隐约透露出军方高层的矛盾。林豆豆说,叶群曾经告诉她,毛泽东在杭州同叶谈话时,具体询问了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和军队五级干部定级名单的事情。毛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总结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是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毛还问:"报到中央的军队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林豆豆口述》)看起来是询问,实际上是质问,话里话外透出对罗的不满和指责。叶群说没有想到毛对军队情况那么清楚。倘若属实,那么这个细节说明另有军方高层人士向毛报告了罗瑞卿的问题,毛对情况已了然于心。2011年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似乎可作佐证,邱在书中就提到毛泽东曾经多次同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人谈话,谈罗瑞卿的问题。

《林豆豆口述》再一次表明,罗瑞卿事件的原因非常复杂,恐怕并非林顾虑罗"抢班夺权"

那么简单(许多当事人回忆,林彪并不想揽权——笔者注)。除了治军方针的分歧、军内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和恩怨纠葛外,罗本人当时身兼数职、权倾一时而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的情况,《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有远比林豆豆申诉材料更为详尽的忆述。更需要弄清楚的是,事件背后到底是否有毛的授意。邱会作就断定,倒罗是毛的意图而非起于林彪,林不过是得知毛的意图后按照毛的意图行事罢了。在档案没有进一步披露的情况下,姑且将此作为一说,以待将来更多档案史料的揭示。

严格地说,申诉材料是记忆性质的文字。记忆的可靠性毕竟有限。申诉材料虽然是林豆豆的亲历、亲闻,但是否属实,还需要通过与其他史料比对与互证才能判别。事实上,笔者参照一些文献资料,已经发现其中一些细节明显有误或令人生疑。

◇ 林彪"事先毫无所知"?

(1)林豆豆称,"12月2日,在毛泽东同志极其错误地作出反对所谓'折中主义'的批示和讲话(据我所知,林彪、叶群是在上海会议结束后几天,从会议发来的文件中才知道的)之后,在上海召开了中央紧急工作会议。"(《林豆豆口述》)

这里所述肯定错了。毛泽东的批示是1965年12月2日作出的,批示不长,要害的文字是下面这句话: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1965年12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搞"折中主义"的人们是谁,毛没有明说,不久人们就知道是指罗瑞卿。这可以说是毛整肃罗瑞卿的第一个信号。这个批示正是毛在看了林彪报送的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后作出的,批示也是写给林彪的。第二天,即12月3日,林彪即回复毛:

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与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五天后,毛还再次致信林,要求将林的上述回信"一同印发"。几则史料都已公开,不难查阅,它们确凿地证明:林彪不仅早已知道毛指责"折中主义"的批示,而且是最早知道的,绝不是上海会议之后才知道。

(2)林豆豆说:"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总长在这次会议上突然被整,林彪事先毫无所知。他也从未对毛泽东同志与其他任何领导同志说过总长的任何不好。毛泽东同志与其他任何领导同志也没有对林彪说过总长有任何问题。"(《林豆豆口述》)

林豆豆又错了。这里说的会议,即1965年12月8日至1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林豆豆说的"中央紧急工作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即批判和揭发总参谋长罗瑞卿。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在杭州同叶群作过一次长谈。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据已经公开的史料,叶群向毛汇报正是林彪派去的,这有林彪给毛的信为证: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联系才知道的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

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 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 彪

十一月三十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9页;《邱会作回忆录》,第382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林彪的信透露出几个信息:第一,向毛报告不只是林彪一人的想法,而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有的提议;第二,促成林向毛报告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此前不久发生的杨尚昆事件(即11月10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被解职);第三,林派叶群去杭州主要是给毛送材料,同时也作初步汇报;第四,林彪准备随时同毛面谈,也就是说,林可能同毛进一步谈罗瑞卿的问题。

哪几个重要负责同志、谈什么重要情况、派叶群送什么材料,林信没有说;至于叶群到底向毛报告了什么,就更不得而知了。但是一周后,毛在上海召开会议,林信和叶群上送的材料均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卜伟华《"砸烂旧世界"》)叶群送的材料有:雷英夫所写对罗总长的意见,张秀川所写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刘亚楼病中给罗总长的信,张秀川所写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雷英夫所写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联名反映罗瑞卿问题的信,等等。除了"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仍然不知所指,林信所说"重要情况"、叶群所送材料都是反映罗瑞卿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说林彪在会前对会议召开、罗瑞卿被整"毫无所知",与史实不符。

反映罗瑞卿的那些材料,也是叶群事先搜集甚至授意准备的。据吴法宪回忆,上海会议前,叶群已经向他透露口风:罗瑞卿出了问题。吴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李作鹏回忆,他和王宏坤(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时任海军政治部主任)三人写信,是叶群授意的。李称,1965年初秋,叶群给他打电话:"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息。""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和首长都知道了。"还说:"他(指罗瑞卿——笔者注)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对当前局面要提高警惕。""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李作鹏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吴、李作为知情人之一,其回忆可以从旁证明,林彪、叶群不是事先毫不知情,而是早已知道,并且授意他人准备了相关文字材料。

同理,说林彪"从未对毛泽东同志说过总长的任何不好"也不成立。至于林豆豆称毛泽东从未对林彪说过罗瑞卿的任何问题,则自相矛盾。如前所述,林豆豆说叶群曾告诉她,叶去杭州面见毛泽东时,毛对叶群发了一连串的关于罗瑞卿的质问;叶群还对林豆豆说:"我就没想到主席对军队这些事的情况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也不清楚主席问我这些是什么意思。"(《林豆豆口述》)叶群是林彪的夫人和"林办"主任,毛泽东同叶谈罗瑞卿问题,叶不可能不转告林彪。所以,也可以说,上海会议前毛已经由叶群同林谈了罗的问题。

当然,需要再次申明,林彪派叶群向毛报告、呈送罗瑞卿问题的材料,是主动出击还是奉 命出击,姑且存疑。

- ◇ 罗出事后,林"忧伤、哀叹、流泪"?
- (3)有关上海会议,林豆豆说林彪事先对叶群的发言毫无所知,甚至听说林彪连会议也没有出席,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发言。(《林豆豆口述》)

据相关著述,叶群在上海会议分三次作了发言,时长合计约十个小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册,第1400页)虽然目前没有确切材料证明是林彪让叶在会上发言,但依常理判断,叶群的发言很可能就是向毛汇报的那些内容。不少当事人和研究者也持此说。既然叶群向毛汇报是林彪派去的,其报告的内容林彪当然知道。故说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林彪"毫无所知",令人生疑。

除了个别当事人曾回忆林彪主持了这次会议(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4期),确无材料显示林彪曾在会议上讲话。但说林彪未参加上海会议,也未必确切。据笔者看到的材料,上海会议的与会者共63人。出席的中央常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列席的政治局成员有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其他列席的人主要来自军方,中委和非中委均有。会议分成三个组,每组20人,第一组召集人是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是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是周恩来、贺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没有编组,但发了会议文件。上海会议不仅事发突然,而且开法特别。据几位参加者回忆,与会者先阅读文件,除了开幕和结束开过全体会,主要是开分组会,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揭发和批判。毛泽东、林彪没有分组,甚至没有在会议上露面。(《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著述提及毛泽东在会上讲过话。(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退一步说,即便没有在会上讲话、没有直接在会上露面,也很难简单断定没有参加。中共高层有时开会很奇特。比如,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本人常常并不亲自参加,不仅不参加分组会,甚至全体会也不参加,很多时候是他对会议作指示,"遥控"指挥。这种情况不能简单说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上海会议也是如此,公开著述都说毛泽东召开了这次会议,而且主持了会议,但又没有披露毛在会议上的任何讲话。林彪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人在上海,且能看到会议的相关文件,但并不亲自参加。因此,不好简单地说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何况,有研究者披露,毛泽东不参加上海会议的扩大会议,但出席常委会。(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既然开常委会,时在上海的林彪不大可能不参加。

(4) 林豆豆还说,罗瑞卿出事之后,林彪"成天低着头,坐着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毛主席";还说林在家中大声哀叹"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 "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林豆豆口述》)

这些叙述不大可信。罗有什么"错误",林彪在派叶群向毛汇报时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些反映罗"反对'突出政治'"、"想夺林彪大权"的材料也是他派叶群送给毛的,不可能不明白"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很可能还在同毛的谈话)里也说得很清楚,仅引一段: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个人主义已到野心家,除非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1964年后即逼林退位。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

林气得昏迷过去。(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上海会议甫一结束,叶群揭发言犹在耳,林彪就质问"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难以置信。从林彪的个性看,也不可能做出如此冲动之举。笔者以为,中共高层领导人里,对毛的个性最了解的当属林彪。不管林内心对毛有何看法,他处理同毛的关系的基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坊间披露的林彪十八则笔记多少能看出这一点。1960年代初,林同叶谈话说过"三不"原则:"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权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龙哲甫《林彪、叶群未公开的十八则笔记》,《国际新闻界》1994年第4期)毛既已决心倒罗,林还要表示异议,甚至要"冲出去"论理,这同林彪处理同毛关系的一贯原则完全不合。

- ◇ 江青、康生"精心策划、突然袭击"?
- (5)关于倒罗的由来,林豆豆提出了一个以往不大见的"新鲜"说法:"江青、康生他们利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挑拨离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之间的关系。""江青他们从正面挑拨不了这种关系,1965年9月后,他们就搞歪门邪道,背着人大委员长,背着国家主席和所有副主席,背着党中央所有副主席进行精心策划后,以极不光明正大的突然袭击手段把人大正式任命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整掉。"(《林豆豆口述》)

江青、康生拥护倒罗,笔者虽未见史料,但大概没有什么疑问。而说江、康精心策划、突然袭击,整掉罗瑞卿,却完全不可信。首先,林豆豆未能提供江青、康生"精心策划、突然袭击"的任何具体史实和史料;其次,以江青、康生当时的地位,也不大可能"背着"高层领导人倒罗。与"文革"时期不同,"文革"前康生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两人一个分管意识形态事务,一个是毛泽东的秘书,与军队毫无关系。而罗瑞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如何能"背着"党中央所有副主席,去策划一个扳倒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的阴谋呢?补充一句,江青也没有参加上海会议。

林豆豆还犯了一个明显的法律常识错误:根据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全国武装力量领导人员的决定权限,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或罢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国防委员会主席由国家主席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国防委员会是一个谘议性质的机构,并无掌管全国武装力量的实权。总参谋部隶属中共中央军委系统,总参谋长也就不可能由全国人大任命或罢免,而只能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事实上,罗瑞卿的总参谋长一职也不是全国人大撤销的。

发生这些错讹,在林豆豆方面,原因也许是多重的,不可苛责。笔者以为,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写于1980年7月。1980年代初期,官方档案开放度极低,历史文献鲜少公布,而中共党史的研究又刚刚恢复,可参考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笔者在本文引述的那些文献资料和研究著述都未披露和出版。倘若林豆豆今天写回忆录,可参考利用的史料要比当年丰富得多,有些错误想必是可以避免的。

□ 《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

严慰冰匿名信案始末与辨析

丁凯文。

严慰冰匿名信案是文革初起时发生在党内高层的一起不大的事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自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给林彪一家投寄了五十几封匿名信,以罕有的下流语言,辱骂林彪一家,并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此事经公安部门的侦查而破案,严慰冰因此锒铛入狱,日后这起案件被称为严慰冰匿名信案。然而,由于林彪的倒台,陆定一、严慰冰在粉碎"四人帮"后得以平反出狱,严慰冰写匿名信的行为被官方誉为"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更有人干脆将严慰冰的行为拔高为"准确地作出了历史的预言"。是耶?非耶?有待于我们对其重新作出历史的评价。

一、恶意毁人名誉的匿名信

严慰冰投寄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都是些什么内容呢?据知情者透露,严慰冰的匿名信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挑拨林家的家庭关系,指称林豆豆不是叶群与林彪所生的孩子;二是对叶群个人的造谣,无中生有地称叶群与他人有染,其中不仅包括早被中共处决的文人王实味,竟然还包括了陆定一;三是恶意辱骂林彪全家。

曾列席 1 9 6 6 年 5 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王力说:"陆定一早就受审查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1)吴法宪回忆说: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还说"叶群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等。(2)邱会作回忆说:"严慰冰是陆定一的老婆。大约从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五年多的时间里,她给林彪一家写了几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从挑拨豆豆同她母亲叶群的关系起,直到乱编乱骂。例如,说豆豆不是叶群生的,说豆豆长得像刘少奇。……陆定一在延安追求过叶群,这是很正常的事,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谩骂叶群,给叶群造谣,总之,信的内容恶毒下流。"(3)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到林办工作不久,从毛家湾现存档案中看到过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的影印件。这是文革前夜中央公安部侦破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信的内容令人读后不堪入目。"(4)

严慰冰的匿名信给林彪的家庭造成极大的困扰,引发了很多无谓的家庭矛盾。林办的秘书官伟勋有一次与叶群闲谈,叶群忽然问官:"你看豆豆长得像不像我?"官回答说"像,既像主任又像首长。"叶群说:"是嘛,人家都说她长得像我,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怀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让'坏人'挑拨的!"〔5〕叶群这里所称的"坏人"就是指严慰冰。正是由于严慰冰长年累月不断地写匿名信挑拨叶群和林豆豆的母女关系,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都非常紧张,林豆豆怀疑自己是叶群的亲生女儿。林家为了证明严慰冰匿名信的捏造,找到了当年在延安时期的保育员、接生员等,证实林豆豆确实就是林彪和叶群的亲生女儿。尽管如此,这已经给林彪一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伤害和无穷的烦恼。

人们不禁要问,严慰冰为何持之以恒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她的目的何在? 1960年以前,林彪一家与陆定一一家基本上没有往来,以往也没有任何私人的恩怨。林彪从事军队工作,但1959年以前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基本上远离中共政治漩涡,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与林彪无缘,叶群更未涉入中共党内任何事宜。陆定一则长期从事党务宣传工作,是中共掌握宣传口的总管。林彪与陆定一在工作上也从无交集,乃井水不犯河水。套用一句俗话来说,林彪、叶群与陆定一、严慰冰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官方钦定的陆定一传记作者为了粉饰严慰冰的行为,罗列了一些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动机:

(一) 严慰冰在延安时期发现叶群"隐瞒历史,虚报党龄";(二)延安时期叶群因为生孩子搞特殊,经常要吃鸡,吃不到鸡就在医院大吵大闹,严慰冰看不惯;(三)解放后叶群向党伸手要权要官,一次次提拔最后成为了林彪办公室主任,且在军内颐指气使,是个女霸;(四)叶群歧视、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儿,引起严慰冰的愤慨。(6)

官版的说辞能否站得住脚?众所周知,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毛泽东、康生搞了一次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自己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承认这一运动"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延安半个月内居然挖出特嫌分子 1 4 0 0 多人。〔7〕叶群实际上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所谓"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纯属无中生有。叶群的入党介绍人是师大附中的地下党员傅英豪,中共建国后曾任空军雷达兵部部长。〔8〕

据知情人讲述,延安时代的生活非常艰苦,林彪与叶群从未向"组织上"要求特殊照顾。叶群生林豆豆时是早产,缺少奶水,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连林豆豆必须的奶粉都搞不到,更未给叶群张罗过任何特殊待遇。严慰冰说叶群在医院吃不到鸡就大吵大闹,纯属无中生有的造谣。

叶群 1 9 3 6 年加入中共,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后辗转去了延安。从资历上来说,叶群属于三八式干部。中共建国后,在五十年代评订军衔时,叶群被评为少校,这也符合当时的定衔标准,并无不妥。叶群那时的主要工作是照顾身体不好的林彪。为了照顾好林彪,叶群不得不放弃自己在教育部的工作,专职做好林办主任,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叶群的任务。〔9〕那时的叶群从未过问过军内事宜(林彪那时尚且不过问军内事宜,更何况叶群),严慰冰指责叶群向党伸手要权要官,"在军内颐指气使,是个女霸",实属恶意诽谤。

林彪与前妻有个女儿林晓霖,对这个非亲生女儿,叶群一直是很照顾的。五十年代时期,林彪在青岛休养时,叶群多次吩咐秘书把林晓霖接到家里,让林晓霖和林豆豆、林立果住在一起。林晓霖要去海边游泳,叶群为了安全还吩咐秘书陪同,并安排好住宿和伙食等。〔10〕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林晓霖生孩子时,叶群特地委托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前去看望,带去叶群精心挑选的婴儿用品。一个家庭难免会有一些家庭矛盾,尤其是不同婚姻而形成的家庭矛盾,在所难免,外人很难判断其中的是非对错,因此世上也就有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格言。严慰冰毫无道理地介入别人家庭的事宜,挑拨别人的家庭感情,制造矛盾,其心态龌龊、卑鄙。

二、严慰冰的精神病

在严慰冰何以持续不断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问题上,陆定一的解释是"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严慰冰为何患有精神病?陆定一的解释是"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整了他们两人的材料……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11〕

据文革期间卫生部群众组织印刷的文革小报披露,从1961年到1966年,陆定一曾为严慰冰组织过六次专家会诊。(12)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诊: 1961年3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粟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广州(当

时,陆定一和严慰冰住在广州)。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第二次会诊: 1963年夏,公安部门已经查明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人就是严慰冰。 这年11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五十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还向薛透露了严慰冰攻击林彪一家的行为。

第三次会诊: 1966年2月18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第四次会诊: 1966年2月21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2月22日和23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第五次会诊: 1966年3月4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会诊:根据第三、四次会诊,医生建议让严慰冰服用药物斯特拉金。由于药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医生们再次给严慰冰做了会诊,询问了病情,并为严慰冰作了体格检查,未发现异常(据当时病历记录),但没有对前几次会诊的诊断提出异议和疑问,仍按原治疗计划给以药物斯特拉金服用。

文革期间这类"红色小报"大都是群众组织内查外调写出来的,从《卫生战报》披露出来的资料,尤其是卫生部主要领导人的亲笔信函等,均可看出卫生部领导对此事是相当重视的。严慰冰有精神上的问题是可信的,严慰冰因精神问题在那几年中请医学专家会诊一事应该也是可靠的。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由于精神上的问题,属于精神不太正常,这应该还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很难想像一个正常的人会长年累月无休止地给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毫无利益冲突的人写匿名信,且主要目的是挑拨人家的家庭关系。由此而观之,严慰冰的行为的确属于精神问题。

三、是谁侦破了严慰冰案?

严慰冰匿名信案是如何侦破的?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林彪破案说",这个说法主要来自官版的陆定一传记。即1966年初的某一天,严慰冰与叶群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发生争吵,严慰冰不忿一状告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的领导人拿着严慰冰写的情况向林彪反映问题,林彪看到这些字迹眼熟,因此想到了匿名信,于是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由此确定这些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13)这个说法流传甚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大都采信了这个"林彪破案说"。

然而,这个"林彪破案说"却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据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严案侦破的关

键,是公安人员通过信件上的邮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点分布、时间密度及到达这些投寄点的路径,从而缩窄了隐藏甚深的嫌疑人的范围。〔14〕另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披露,严慰冰匿名信案是由公安机关侦破的。凌云如是说:"1966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找谢富治、刘复之和我去,谈的是关于陆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这些匿名信大多是明信片,从1960年起已经延续了一个时期了,是针对叶群并直接寄给叶群和叶的女儿的。只要与严熟悉的人,一看就能辨别出写信人是谁。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当时徐子荣、我和海宇都认为是病态,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曾口头报告彭真,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就把此事放下了。"〔15〕

从凌云所谈的这段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事,公安部门早就掌握了情况,并非是官版陆定一传和后来某些人杜撰出的那个离奇情节: 1 9 6 6 年初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吵架,最后导致林彪破案。

第二,严慰冰写匿名信大都以明信片的方式,并且直接寄给叶群和林豆豆。凌云虽然没说匿名信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后来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严慰冰写这些匿名信的目的主要是挑拨叶群与林豆豆母女之间的关系,既非如官史所说的"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更不是某些人刻意拔高的严慰冰"准确地作出了历史的预言"。

第三,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时总要了解严慰冰的作案动机,公安部门根据严慰冰就诊记录就已经判断出严慰冰的表现属精神方面的问题。

第四,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后,由于兹事体大,涉及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公安部门不能擅自作主,于是向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作了汇报。然而,彭真对此却认为"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就把此事放下了"。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16〕由此可见,刘少奇所言非虚,与凌云的说法相互印证。

事实证明,官版的陆定一传记里的"林彪破案说",纯属向壁虚构。此案的侦破应归功于谢富治领导下的公安部。

四、严慰冰匿名信案为何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既然严慰冰匿名案早在1963年就由公安机关侦破了,为何从1963年到1966年 初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严慰冰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阻止?但是陆定一确实因为此事曾带严慰冰 看过精神科医生。

从上述严慰冰医疗会诊的情况来看,从1961年3月的第一次会诊到1963年11月的第二次会诊,这期间隔了两年半。从1963年11月到1966年2月的第三次会诊,又隔了两年多。这说明陆定一虽然给严慰冰作了医学会诊,但是并未特别重视。

然而从1966年2月中到4月初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竟然给严慰冰密集会诊了四次, 而此时正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最紧张的阶段,也是彭真、陆定一等人面临毛泽东打击最难过的 时期。此时的毛泽东正领导江青、张春桥们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发起攻击。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极为不满。毛泽东通过江青导演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指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坚决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此时的毛应该已经下定决心,通过彻底扳倒彭真、陆定一等人,最终顺藤摸瓜揪出他们背后的刘少奇。相信此时的彭真和陆定一应该感受到了毛泽东那股咄咄逼人的杀气。此时的严慰冰匿名信案恰似火上浇油,给这一政治斗争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公安部门对严案的侦破使得陆定一无路可退,唯有通过卫生部门确认严慰冰患有精神病也许才能逃过毛泽东的这一波打击。

据官方钦定的陆定一传记,1966年2月初,彭真约谈陆定一。彭真在谈话中向陆定一出示了公安部转来的的严慰冰匿名信照片,陆定一大吃一惊,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了这么多匿名信。〔17〕接下来的短短一个多月内,卫生部出面为严慰冰密集组织了四次会诊。如果不是出自"组织上"的刻意安排,严慰冰如何能在这么短的特殊时间内享此待遇?当然,官版的陆定一传记是不会述及卫生部为严慰冰组织的这六次会诊的。

陆定一是否真的不知道严慰冰的所作所为? 陆定一在这一事件上死咬不知情,日后官版的传记也都统一口径予以否认。但是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18〕陆定一是否知情姑且不论,刘少奇这里所说陆定一"用多种方法包庇严"应该就是指陆定一请医学专家为严慰冰会诊精神病及医疗一事。

抛开文革小报里那些人身攻击和极左的词藻,我们应该承认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问题在于,既然公安部门和中央一线工作的衮衮诸公们早就发现了严慰冰的这些活动,为何他们却袖手旁观,既不出面制止,也不及时采取措施使严得到必要的治疗,任由严慰冰持续不断地投寄此类匿名信,直到1966年初中央的政治斗争马上就要烧到彭真和陆定一的头上时,陆定一才临时抱佛脚给严慰冰作医疗会诊?正是因为中央掌管政法系统部门的彭真和公安机关的完全的不作为,致使严慰冰在写匿名信一事上"越来越猖獗"(刘少奇语)。笔者认为,彭真等人之所以渎职、不作为,还是出于官官相护。陆定一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部长,同时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诚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彭真对陆的老婆严慰冰的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也算是同气连枝,惺惺相惜吧。

五、中共中央对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处理

中共中央在处理严慰冰案一事上颇动了一番脑筋。 3月6日陆定一被中央要求南下外地。 其实这也是为了更方便中央处理严案。周恩来为此专门找陆谈话,对陆说: 你最好到外地去, 时间越长越好。陆定一先后去了上海、南昌、井冈山、吉安、景德镇、芜湖、合肥。 4月30 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到合肥,代表中央与陆谈话,告知严慰冰已被中 央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于4月28日被逮捕。与此同时,杨、张还传达中央的五条指示: 不 要泄露消息; 不与严慰冰家人联系; 继续留在外地,不要回京等。张子意还与陆个别交谈,建 议陆定一写信向中央表示自己的态度。陆定一接受了这个建议,写信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 措施并遵守中央的几条规定。惟5月6日陆定一接到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政治 局扩大会议。陆遂于5月8日乘机飞回北京。(19) 从这一过程来看,中央早就筹划好了如何处理严慰冰一案,先是将陆定一调离北京,然后再实施对严慰冰的逮捕,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清算彭真、陆定一等人。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刘少奇主导党务,而具体负责此事的就是周恩来。据凌云回忆,1966年3月份,周恩来找谢富治、刘复之和凌云谈话,凌云说:"这次周总理找谈情况不同了。周总理要我连夜把信(指严慰冰匿名信)复制多少份,我一个晚上没睡觉,夜里周总理给我打了几个电话,他的秘书也来过一次,最后天亮,周总理电话中让我把复制件送到一个地方。随后我才知道这些匿名信复印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的。在这个会上彭真、陆定一已点名挨斗,严慰冰也被隔离审查了。"(20)

在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手书了一纸声明: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1966年5月14日"

林彪手书的这封证明信就是因为严慰冰匿名信对叶群和林彪一家的恶意中伤,林彪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夫人找回清白。其实,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子汉,都无法容忍他人对自己和自己的配偶作如此无中生有的造谣和诽谤,更何况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

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曾质问陆定一:"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个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21〕所有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对严慰冰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军队干部尤甚,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在会上发言表态。杨成武干脆走到陆定一面前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并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22〕

周恩来在会上对陆定一作了严厉的斥责。邱会作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对此案,周总理的态度是严肃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会上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总理批评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应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23〕

由此可见,一旦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发话后,就会动真格的了,一切必要的手段都会拿出来。 与彭真的不作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周恩来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亲历亲为,兢兢业业,一丝不 苟地将全案一抓到底,一举完成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中央针对严慰冰匿名信一案,在5月24日发出中央文件,将其定性为:"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

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24〕1967年2月严慰冰被关进大陆政治犯监狱——秦城监狱。

六、严慰冰匿名信案与陆定一的倒台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他们在论及陆定一的倒台问题上,大都归结为林彪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仇恨。如已经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就认为:"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25)按照这一逻辑,毛泽东本人并不想打倒陆定一,而是林彪与陆定一、严慰冰之间的私仇作祟,最终毛泽东的政治天枰倒向了林彪,由此陆定一成为牺牲者。

陆定一在文革前紧跟刘少奇、彭真,早就不得毛泽东的欢心了。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领域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再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事实上,陆定一从那时起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这篇背着北京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搞出来的文章实际上是对 他们和中宣部的一个"突然袭击"。正因为彭真、陆定一等人对该文的背景不摸底,故采取了抵 制的态度,北京各报拒绝转载姚文。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下令发行小册子,但是北京方面对 上海方面的订购迟迟不作表态。后来在毛泽东的压力和周恩来的斡旋下,北京各报虽然转载了 姚文,但彭真却试图将这一讨论限定在学术领域之中,且不同意将吴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 子,试图保护吴晗过关。1966年2月5日彭真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送给在 京的政治局常委,并作了说明。陆定一当时同意该提纲的内容,认为学术争论不应变成政治批 判。随后,彭真、陆定一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对此显然是极为不满的。3月1 7日到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专门研究下一步如何展开批判的问 题。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 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 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 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 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押他们的稿件。 毛泽东特别提出: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而农村工作部于1962年被取消。毛泽东虽 然没有点陆定一的名字,但是其含义已经很明显了,即陆定一可能像当年的邓子恢那样当不成 部长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分别或一起谈了三次话, 批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毛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做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 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还说,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 "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店,要打到阎王,解放小鬼。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26〕

毛泽东口中的"阎王殿"就是陆定一领导下的中宣部,毛泽东要打倒的"阎王"正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即使没有严慰冰写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陆定一在文革初起时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所打倒,严慰冰的匿名信案不过是为这场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花絮而已。那种指称陆定一倒台是因为严慰冰匿名信东窗事发的说法,不过是将毛泽东玩弄的政治斗争简单化,抑或是对历史的无知,前述高华的论点至此也就不攻自破了。

七、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后续

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决定将陆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养起来。决议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第25号文件,下发全国。该决议提及严慰冰案时说"从1960年3月至1966年2月,查获陆定一之妻严慰冰发出攻击林彪、叶群的匿名信三十二封。在尚未发现林彪、叶群的问题之前,严慰冰采取这种手段,陆定一对她加以包庇是错误的,对他们进行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该文件所言"离京回原籍"一事并未兑现。

据邱会作回忆: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要把我们放出去"养起来"。但是上海帮和汪东兴等人抵触,说: '不能暗着走,要明着走'。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周恩来自顾不暇,没落实。据说,那一次安排出去'养起来'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我、李雪峰、陆定一等人。"(27)粉碎"四人帮"后,陆定一多次申诉,在胡耀邦的关怀下,陆、严两人在1978年12月方被释放出狱。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的通知。〔28〕该复查《通知》将陆定一的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诬陷陆定一同志阴谋反党。以后经中央批准进行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经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逮捕入监。"

关于严慰冰匿名信问题,该复查《通知》说:"经查,据病历记载和医生证明,严慰冰同志在写匿名信期间患有精神病。当时陆定一同志并不了解她写匿名信的情况,事后也不存在包庇的问题。"

这样一纸复查《通知》轻轻松松地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似乎陆定一、严慰冰的倒台与他们毫无关系,都是林彪一手造成的。日后官版的陆定一传记也悄悄地篡改历史,编造出一段离奇的故事情节,将匿名信案的侦破时间从1963年向后推迟到1966年初,将侦破匿名信案的主角从公安部悄然换成了林彪,瞒天过海地将彭真和公安部门的不作为隐匿过去,陆定一、严慰冰被打倒和遭迫害的原因也就顺理成章地归结到林彪身上。但是文革史家余汝信就此问及:"屈指算来,陆、严被囚禁几近十三年,其中1971年'913'事件后七年。要说'迫害',这后七年的'迫害'账,无论如何也算不到林彪、叶群头上的了,那么,算在谁的头上?"(29)

◇ 几点简短的总结

1、严慰冰匿名信案不是政治性案件,仅仅是单纯的人格侮辱、造谣、诽谤和骚扰他人家庭罪。此案如果发生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警方会很快予以处理,将其制止并绳之以法,不

会放任肇事者肆无忌惮、长年累月从事这类犯罪活动。遗憾的是,中国的公安机关在侦破此案后竟然无所事事,放任严慰冰的活动达五年之久。这也是中共高层政坛生活中的一个奇景。

- 2、经过医学专家们的鉴定,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出于精神上的问题,这点应该可以确认。中共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将其打为反革命,且关押13年,实为政治迫害。此点应无疑义。问题在于,当初如果公安机关侦破此案后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至少使严得到有效的治疗,防止严再次从事类似的活动,也不至于闹到后来那么严重的程度。显然,中共政法机构在此方面确有严重失职。
- 3、粉碎"四人帮"后,严慰冰被平反出狱,在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的大潮下实属必然。然而严慰冰的行为却因为林彪的被打倒而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严慰冰写匿名信本身也变得"高大、正确"起来,甚至被官史美化为"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而根本无视这件事本身的犯罪性质,即使严慰冰的行为可以用精神病发作为由而脱罪,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事实证明,只要政治力量介入,司法也就没有了公正,而历史本身也会被当政者随意扭曲、篡改。这在当下的中国仍然大行其道。
- 4、中国受几千年来皇权专制制度的影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某个政治人物的得势, 其家人亲属也一起跟着沾光,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呼风唤雨、左右政坛。严慰冰夫贵妻荣, 乃至彭真在公安部破案后竟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其实,日后的江青就是绝好的一例,江 青在文革中在毛泽东的庇佑下纵横中共政坛十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如余汝信所言: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仅仅从个人品质的优劣去解读往昔而不是从制度设置的落后性方面, 理性而又深刻地反省夫人干政这一类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糟粕对国家民族的严重危害,那么, 我们的意识不仅尚与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理念还相去甚远,而且,也实难彻底根除类似文革这 样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的可能。"〔30〕

注释:

- (1)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
- 〔2〕吴法宪《岁月艰难一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02页。
- 〔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438页。
- 〔4〕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 〔5〕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 (6)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 -257页。
-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3页。
- 〔8〕罗浮山《走近林彪夫人一叶群》,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页。
- 〔9〕罗浮山《走近林彪夫人一叶群》,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621-622页。
- 〔10〕宋德金《真实的林彪一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皇福图书,2008年版,第170页。
- (11) 陈清泉《在中共高层 50年: 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58页。
- 〔12〕《反革命"会诊"案件内幕》,载《卫生战报》第三、四期合刊,1967年6月13日。
- 〔13〕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

8-259页。

- 〔14〕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华夏文摘增刊 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2000年12月版,第77-78页。
- 〔16〕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 0年版。
- 〔17〕陈清泉《在中共高层 50年: 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255页。
- 〔18〕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 0年版。
- (19)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4页。
-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2000年12月版,第77-78页。
- (21)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
- 〔22〕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38-440 页。
- 〔2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38-439页。
- 〔24〕《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05。24;中发[66]278号,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 〔25〕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载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 〔26〕郝怀明《文革初的中宣部》,《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
- 〔27〕程光《心灵的对话一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版,第722页。
- 〔28〕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 0年版。
- 〔29〕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 〔30〕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华夏文摘增刊 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百裁	《新史记》	2	Λ	1	3 任 6	日 当 笋 1	1 相
1 1	JT 4V	// *// // // // // // // // // // // //	/.	11		.) 44 ()		4 50

【文革一页】

"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

• 阎长贵 •

"大闹怀仁堂"会议,即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亦称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谭震林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

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总理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还有很多,但这些是主要的。(参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0 3 年版;《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阵线分明、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的会议,矛头直指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及其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这次会议在当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九一三"事件以前),被称为"二月逆流",遭到完全否定,并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文革"后叫做"二月抗争",即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亦称"三老四帅")所进行的完全否定和反对"文革"的正义斗争,其功勋彪炳千秋,名垂青史。

这样一次会议的记录是什么时候整理、怎样整理的?对这个问题,在政界和史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说法。究竟哪种意见和说法符合事实,这是应该辨别清楚的。

◇ 是否"当晚"江青指示整理?

先介绍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和意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二月逆流"的条目中说:"二月十六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大雪压青松一一"文革"中的陈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当晚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谭震林传奇一一从印刷工到副总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年版)中说:"……恶人先告状,就在 16日的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顾不得吃晚饭,根据康生的指使,驱车钓鱼台,直奔 16号楼(应为 11号楼——笔者注)江青住处。""江青听完他们的汇报,简直暴跳如雷,镜片下的眼珠闪着逼人的凶光,歇斯底里地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政治事件,我们要抓住,赶快把记录整理出来。'""人民大会堂的一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强烈的灯光下,面色灰白,鬼头鬼脑地'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三人各施心计,绞尽脑汁,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边核对各自的记录,边回忆补充,边无限上纲,一份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记录》稿匆匆出笼。"

"江青看罢《记录》,略露的门牙咬得咯咯作响,气恼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陈毅、谭震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聂荣臻是附和错误 路线,周恩来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一副太上皇的架势,指指点点。张、姚、王三人暗喜:若毛主席听了江青的亲自汇报,激怒起来,那才有好戏看哩!"

"可江青却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似乎这样更能达到预谋的目的,

她挥笔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

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 盼速见。

江青

纸条密封后,派专人直送中南海。

三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见张、姚、王。"

这几段话浮想联翩、绘声绘色,把"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产生的时间、过程都描述(实际是演绎和编造)出来了。

《中国元帅聂荣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中说:"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

《陈丕显回忆录一一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0 5 年版)中说:"怀仁堂会议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连夜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

暂且引这些吧(无疑还有其他书籍和文章采用类似说法)。上述数书所说的,都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整理了会议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出版的权威的党史书上也这样说。不仅如此,这种说法在学界、在网上,都传播开了,都采用了。《"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 2 0 0 9 年版)中说:当天(指"大闹怀仁堂"的 2 月 1 6 日)夜里,张春桥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 2 月 1 6 日怀仁堂会议》。

◇ 王力、王广宇的回忆

这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有这份记录的真实性及其后来的用途等问题)需要澄清,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的时间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应该说,有的著作已经做了如实的叙述。兹举几例——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说:"会后(指2月16日怀仁堂会议),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这里根本没谈整理会议记录的问题,我想当晚如果确有整理会议记录的事,这里不可能不谈到——笔者注)

《叶剑英"文革"风云录》(中华文化出版社 2 0 0 1 年版)中说:许多学者认为《 2 月 1 6 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有"造谣"成分,不真实,王力说"没有造谣之处"。记录不是当天晚上整理的。是事后周恩来命王力整理,"清样由周恩来、康生审定修改,在 2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周恩来命他(指王力)在会上读过的"(此书说法根据王力《现场历史一一文化大革命纪事》,笔者很抱歉没查到,但确信有这本书,并认为该书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对的一一笔者注)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中说:周恩来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毛泽东听到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后,在18日深夜或19日凌晨,召集会议,

大发脾气,认为这是要翻延安整风的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要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为此,周恩来主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笔者注)……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加上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人们可以看到这两本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一致的,即 2 月 1 6 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的时间,不是 2 月 1 6 日当天晚上,而是事后。我们可以想想,当天晚上几个钟头的时间能够整理出一次会议的记录,并向江青和毛泽东汇报吗?要知道,整理会议记录,不是会议现场速记员作"速记"——"速记"除了专业人员谁能看得懂?

下面,再看看关于"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的两位当事人的说法。

一个是王力的说法。王力是会议的参加者。他说:会议开到七点,总理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就宣布散会,总理没当回事。刚一散会,姚文元就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约王力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将情况对一对。"我也赞成对情况,我说不能歪曲事实。我记下了要点,造谣是没有,当时认为是不对的话,都对上了,包括总理、康生、陈伯达的。(注意:他们说的是对情况,不是说整理记录一一笔者注)接着张春桥去报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你们三个人都要去"。江青马上打了电话……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可以看到, 王力根本没谈 2 月 1 6 日当晚整理会议记录的问题。按王力的说法,这次会议从七点散会,他们三人"对情况",接着向江青汇报,十点左右到主席那里"告状",其间不过三个小时,纵有三头六臂也整理不了会议记录啊。

另一个是经手印刷会议记录的王广宇的说法。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他写有一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收录在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问史求信集》)。王广宇在文中说:

1967年2月中旬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留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已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张春桥、姚文元18日已回上海——笔者注)。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王力说法,李富春在会上未发言,所以记录中没他的名字,这是否王广宇记忆有误——笔者注)和谢富治等的发言。会议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总理、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不太记得陈伯达有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总理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总理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总理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

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还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主席、林彪、总理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一下,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几份文件以及发放的人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8月31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没有毁灭,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个记录稿应是完整的。

二月十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

按王广宇的说法,"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更不可能是2月16日当晚整理的了。

这就是我经过一番书面调查掌握的"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的整理情况。我想,读者是可以从中了解到这次会议记录整理有关真相的。

□ 《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

【回首文革】

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出笼

吴林生。

现回头看,"文革"歌曲都非常粗制滥造。那首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以下简称市宫)创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靠空洞的口号为"文革"自我壮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首先在1974年3月5日的"批林批孔"专场上演唱,在后来的歌咏大会上,尤其是在"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场和"深入批判邓小平"歌咏大会,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直至唱到全国。

它的出笼经过是这样的: 1973年元旦,被关闭了6年之久的市宫重新开放,我担任副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我兴趣广泛,参加过美术班、摄影班,也曾经担任过厂工会的文教委员,"文革"中在市工代会政宣组工作,被认为适合市宫的工作。市宫最重要的业务是各种培训班,这是由文艺组负责的,我主要负责抓文艺组。而文艺组主要办培训班。我们办过十几种培训班,如戏剧培训班、诗歌班、美术班、管弦乐班、作曲指挥培训班等等。后来在"文革"中非常出名的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就是市宫诗歌班的学员写的,算是集体创作。旋律是作曲指挥培训班的学员,与市宫请去作为辅导培训班学员的专业音乐家一起写的,被当时的群众歌咏大会唱红的。

那是1973年12月10日左右,上海市文化局群众文艺小组负责人来市宫,向我和另几位市宫负责人转达了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的建议:要我们组织群众歌咏大会。朱永

嘉说"最近在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中,流传着一些坏歌,我们要有好的东西去占领它"。朱永嘉建议:"你们先搞它两三台,名称可以叫歌唱码头工人,歌唱城市民兵,歌唱上山下乡。演出时台上台下相呼应,搞得好,电台可以教唱。"还建议说,你们可以搭个临时筹备班子,就放在工人文化宫。

我们汇总建议和意见后向当时的上海市工代会主任叶昌明作了工作汇报,叶昌明同意。就 这样,群众歌咏大会的筹备班子成立了,由市文化局的群众文艺小组和市宫各派人员参加。我 是副组长。

当时国务院文化部的《战地新歌》征歌小组要上海提供"文革新歌"。我们回来后,一方面组织歌咏大会,一方面结合歌咏大会,创作和发现歌颂文革的新歌,给《战地新歌》。我们决定,就按朱永嘉的要求,首先筹备码头工人、上海民兵、上山下乡三个专场,而且三个专场同时筹备。为了筹备码头工人专场,我们去找了上海港务局的党委书记,港务局党委表示支持,说可以和他们局即将召开的工代会结合进行。

1974年1月12日,上海"文革"中的首场群众歌咏大会"歌唱码头工人专场"在南京路上的原上海杂技场举行。接着,1月14日"歌唱民兵"专场,1月17日"歌唱上山下乡"专场,都在上海杂技场举行。歌咏大会所唱的歌曲,有一半是专门新创作的。1月17日的"歌唱上山下乡"专场结束后,在杂技场的休息室,朱永嘉对歌咏大会筹备班子人员以及报社、电视台等人员讲话。他对这样的唱歌形式非常赞赏,要报纸刊登特写,还提出可以灌唱片。后来报纸上果然连续刊登了好几篇文章,不过灌唱片之事后来没再提起。

1974年2月上旬,王秀珍在上海工会系统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市宫的歌咏大会筹备班子商量,准备配合"批林批孔"搞一场歌咏大会。1974年3月5日的"批林批孔"专场上,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首次公开演唱。上海市革委会的徐景贤和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于会咏也来看。当年,国务院文化部编纂的《战地新歌》第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这首歌。

群众歌咏大会从1974年1月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由我们总工会出面,市宫具体组织的、包括和市妇联、团市委、市"红代会"等等有关机构,一起举办的歌咏会共有18场。举办日期和专场名称,据记载是这样的:

1974年1月12日"歌唱码头工人"专场,1974年1月14日"歌唱民兵"专场,1974年1月17日"歌唱上山下乡"专场,1974年3月5日"歌唱批林批孔"专场,1974年3月15日"歌唱上山下乡"专场,1974年3月5日"歌唱批林批孔"专场,1974年3月30日"歌唱教育革命"专场,1974年7月4日财贸系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专场,1974年7月25日"歌唱工宣队"专场,1974年11月19日"学习风庆轮革命精神"专场,1975年1月5日"革命儿歌"专场,1975年1月14日"歌唱国营农场"专场,1975年1月23日"热烈庆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歌咏大会,1975年3月6日"歌唱妇女新面貌"歌咏大会,1975年5月21日"学习革命样板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歌咏大会,1975年7月13日"歌唱教育革命"专场,1975年12月20日"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新民歌演唱会,1976年5月23日"歌唱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邓小平"群众歌咏大会。

这些歌咏大会演唱的大多数歌曲,都是配合形势新创作。词和曲主要是群众歌咏大会筹备 小组组织专业、业余作者创作,当时的文化局在每场歌咏大会时均组织若干词曲专业作者参加。 因为歌咏大会是我们和他们联合举办,所以他们给我们派来了专业人员,例如作曲家朱践耳, 还有孟波等,辅导和帮助我们作词作曲;为使大会开得热闹,文化局还派来具有号召力的专业指挥家司徒汉,18场歌咏大会的大多数场次均由他指挥。

如今看来,歌咏大会的内容都是配合"文革"政治需要的应景之作,艺术上非常粗糙,思想内容更是荒唐。靠组织群众歌咏赛造声势,这种硬性推广生命力又能维持多久呢?

□ 《世纪》2013年第4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 (美国)

思语 (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 页: //www.cnd.org/
